

文化印记



福州路三百九十号，有一幢七层建筑，现在是外文书店，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曾是上海出版界赫赫有名的出版机构——世界书局。

范家乐 摄



曾入驻福州路上一幢中西合璧奇特建筑的大东书局。 资料图片

百年中乐铺的香江传音

每到周末，位于九龙西部石硤尾的一间约10平方米古琴工作室便热闹了起来。锉刀及各种工具的声音此起彼伏，斲琴匠人不时停下来用手把握琴的弧度，而一旁墙上等待张弦的古琴漆面洁净无瑕，让这个充满古韵的空间显得很是明亮。

这里就是百年中乐铺“蔡福记”。它在20世纪30年代从汕头迁至香港，第三代传人蔡昌寿(又名刘昌寿)是为数不多承袭南宋始创的浙派古琴艺术的斲琴人。

斲琴技艺在蔡昌寿及越来越多的香港琴人中薪火相传，传递千年回响。

师承浙派

斲，音琢，斲斲之意。斲琴，就是择良木斲作成琴的艺术。古琴有三千年以上的悠久历史，是中国最早的弹拨乐器之一，位列“琴棋书画”四艺之首。与古琴相关的艺术除了演奏外，还有琴谱解读和造琴，合称“琴谱、斲”。

浙派古琴大家徐文镜“琴、谱、斲”三者俱善。20世纪40年代，他因治疗眼疾而来港定居，机缘之下将斲琴的艺术传授予蔡昌寿。

“蔡福记”的前身为祖父蔡春福在1904年于汕头创办的潮州乐器店。1935年，蔡家移居香港，其父再开设乐器制造厂，主营传统潮州和客家乐器，兼造西洋乐器。

整日流连于父亲的乐铺，蔡昌寿从小便对古琴、古筝、小提琴等中外乐器感兴趣。有一回，十九岁的他受父亲之命将修好的古琴归还给徐文镜，未曾想自此师徒缘分。

不久，蔡昌寿央求徐文镜收他为徒，未被当即应允，后经人推荐才如愿。逐渐失明的师父以手代眼“口传心授”指导他斲琴要领，徐氏一脉的古琴艺术从此在香港落地生根。

从面板与底板的薄厚、纳音的高低、龙池凤沼的搭配，再到岳山、承露、雁足等配件的安装，蔡昌寿跟随师父学艺9年，技艺日益精进。

1969年，“蔡福记”由年富力强的蔡昌寿主理，并更名为蔡福记中西乐器制造厂，斲琴数量逐渐增加。他说：“古琴是文人乐器，也与我性格匹配。”

20世纪60年代至今，蔡昌寿亲自斲琴超过250张，包括十余种样式。

巧斲琴

从原木到良琴，需经寻选良木、开斲琴形、刨琴面、挖共鸣箱、打磨、上漆、张弦等九个步骤，从头到尾都要由斲琴师一人完成，这是蔡昌寿斲琴的一大特色。

由于木材是塑造琴身最重要的因素，寻找良木是蔡昌寿最重视的传承课题之一。琴材以存放多年、自然干燥的旧杉、梧桐和梓木为首选，不易变形，且发音清透。

由于杉木广泛用于中国南方的旧建筑，拆旧屋得来的梁柱、大门或旧木家具往往内藏经历百年寒暑的珍贵琴材。虽然已储备不少百岁古木，但只要知道哪儿有旧屋拆卸，蔡昌寿都会迫不及待地跑去“寻宝”。

自开木算起，完成一张琴平均需耗资200小时，每一步工序都需要匠人细腻的耐心和敏锐的感觉做到匠心独运。

跟随蔡昌寿斲琴20余年的关嘉汇，现在是蔡昌寿斲琴学会的副会长。为了实现琴面效果，他曾在两张琴的上漆环节前后花费三年时间。前两年半是在琴面层层叠叠堆起凸颗粒，形成如同涟漪的纹理，最后半年让他们打磨，显现出一环一环的漆色层次，再上熟漆并退光。

来自新加坡的关嘉喜跟随蔡昌寿学习近10年。他说，有的琴追求音色温润，有的专注琴身质感，做不同的琴是为了实现心中不同的理想。谈及斲琴的体会，他说，师父教给他最要紧的是珍惜和尊重材料。“斲琴人和材料之间是一种对等的关系，尊重材料原本的条件，而不能硬要它怎么样，要顺其自然。”

弦音不绝

1992年，蔡昌寿生了一场大病。他遣散了乐器厂的全部雇员，全力与病魔抗争。

大病初愈后，蔡昌寿曾认真地考虑就此退休。这时，好几位与他有深交的香港琴人请他开班收徒，把珍贵的斲琴艺术薪火相传。

经再三请求，他的斲琴研究班终于在1993年7月开班授课。昔日的厂房被改作教室，徒弟们用到的工作台、工具和材料都由蔡昌寿提供，这位乐器厂的主人由此开始了他的传艺生涯。

斲琴艺术通过师徒而传承，并在琴人之间流传。蔡昌寿希望弟子们把斲琴视为艺术修为，而非功利的手段。想要拜师人，不必有木工经验，性别亦没有限制，但要会弹奏古琴，因为蔡昌寿觉得不懂得弹琴的人无法分别琴的优劣。

“古琴艺术”于2014年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8年，国家文化和旅游局公布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蔡昌寿入选。他成为香港特区第三位“非遗”传承人。

古琴的形制于约1800年前的魏晋时期已经定型。现存唐代的琴曲，仍可复现弹奏，穿越千年的音韵宛若天成。

“古法”精深，如何传承?在蔡昌寿看来，“古法”并不代表穿着古制刻意使用已淘汰的旧方法工作。古人格物致知，对乐理有了透彻理解，才找到打动人心的琴音，因而正确学习古人对音律的理解，才是传承“古法”的关键。当现代技术比旧方法好，他便不会守旧。

30年春风化雨，蔡昌寿累计收了超过50名来自内地、香港和澳门的学徒。“斲琴人”三个字是他对自己的称呼。虽已耄耋之年，他逢周末仍会来到工作室，陪伴徒弟们制琴。作坊里木工的声音令他安心，仿佛又回到了初见古琴的时光。

郑欣



挑一鸣

“斲琴人”蔡昌寿。

寻找老建筑里的旧书局

和风徐徐，漫步在上海的大街小巷，看着周边一幢幢被岁月抚过的建筑，寻觅着书香，也寻找一种旧日的时光。

外文书店的前身，是曾赫赫有名的出版机构——世界书局

在福州路中段山西南路、福建中路之间，即福州路390号，有一幢七层建筑(原为四层，后加层)，现在是外文书店，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曾是上海出版界赫赫有名的出版机构——世界书局。世界书局创立于1917年，1921年改为股份公司，创办人为沈知方。

沈知方曾供职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有着丰富的图书市场经验。1917年初沈知方辞去中华书局副经理之职，以三千元资本在上海闸北义品里及福州路青莲阁茶馆对面弄内其昌旅馆，以“世界”之名进行图书出版和销售。1921年正式将世界书局改为股份制企业。世界书局设在福州路山东路西首杯远里内，并在福州路390号—392号租得店面营业，沈知方把所租店面漆成红色，号称红屋，在当年也是别具特色。

创业之初，世界书局由于势力单薄，多出一些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的书籍，和礼拜六派的言情小说、武侠黑帮小说和迷信算命等书。它也出版了一些定期刊物，有《红杂志》(周刊)、《快活》(旬刊)、《红玫瑰》(周刊)、《家庭杂志》(月刊)、《侦探世界》(半月刊)等等，这些刊物都深受小市民阶层喜爱。后来，世界书局在用心经营中逐渐壮大，也参与了各类教科书出版，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展开激烈竞争，取得了不错的销售业绩。世界书局还出版由徐蔚南主编的《ABC丛书》一百余种，多为名家撰稿，曾风行一时。世界书局用廉价赠品等促销手段大肆宣传，一时营业额鼎盛。1921年至1923年间，全局共有职工一百余人，并设编辑所、印刷厂于闸北香山路口及虹口，又在广州、北京、汉口、奉天等处设分局。改组公司时资本为银币二万五千元，选出了董事沈知方等五人，又设监察两人。总经理沈知方全面负责公司业务，下设营业部、信托部、会计部、分局事务部、门市部、批发部、函购部及编辑所、印刷厂，各部门有专人负责，可谓规模初具。

1937年8月日军占领上海后，强占上海世界书局设在虹口大连湾路的总厂为军需，并威胁世界书局与他们合作。遭沈知方反对后，日伪于1938年11月在世界书局发行所制造了定时炸弹爆炸事件，导致书局职员一死一伤。1939年，沈知方病重之时立下遗嘱：“近遭国难，不为利诱，不为威胁”，命其后人不得向日伪妥协。同年9月11日，沈知方病逝于上海。沈知方去世后，由陆高谊任上海世界书局总经理。1945年7月抗战胜利后，陆高谊辞职离沪，由陆仲良代理。董事会复选董事为张静江、杜月笙、钱新之、陆高谊、崔竹溪、李书华、陆仲良、陈和铎、胡天石、魏炳荣，监察人吴稚晖、李麟玉、齐云青。1946年1月起，李石曾为总经理，官僚资本进入世界书局。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世界书局被人民政府接管，同年4月12日在世界书局旧址成立国际书店上海分店，1958年更名为上海外文书店，营业至今。

百腾大厦所在地，曾有座中西合璧的塔楼建筑，见证大东书局往事

沿福州路再往东，在山西南路附近的福州路310号、福州路311号，是大东书局旧址，以前还有座塔楼(小白楼)，原是《时报》馆大楼。据高浦档案馆《时报馆——中西合璧的奇特建筑》记载：“《时报》创办人狄葆贤于1921年建造新的时报馆。新馆面向东南，混凝土结构，占地1081平方米，建筑面积4981平方米，共七层，通高25.64米。底层有欧式拱券门和爱奥尼克柱式装饰，东、南两面均为西洋风格，上部还有巴洛克式山花装饰。

在三层顶部辟有屋顶花园，种有花木，安放桌椅，供人游览息憩。东南转角处建有中国传统风格的八角形塔楼，飞檐翘角加葫芦顶，但门洞为欧式拱券装饰，塔身周围挑出阳台，供游人登高赏景。这幢中西合璧的建筑是当时上海一道奇异的风景。《时报》馆新楼落成时，民国政要和各界名流纷纷题词祝贺，孙中山题“宣传文化”，黎元洪题“扬光飞文”，蔡元培题“日新又日新”，马相伯、章太炎、唐绍仪、伍廷芳、严范孙以及外国学者杜威、罗素、卜幼济等也撰文、作诗或题词致贺。”

1929年《时报》迁至浙江路的小花园处，塔楼建筑交由大东书局经营。

大东书局1916年在上海创办，由吕子泉、王幼堂、沈骏声和王均卿四人合资经营，1924年改为股份公司，沈骏声仍任经理。发行所初设上海福州路望平里，1921年迁到福州路110号，1931年又迁到福州路310号、福州路311号。大东书局主要出版中小学教科书、法律、国学、中医、文艺、社会科学丛书和儿童读物等，还出版了一批具有学术、史料和文献价值的图书，如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江恒源的《中国文字学大意》，厉尔康的《国防与物资》，于右任的《右任诗存》等；此外也出版《四库全书总目》《中国医学大成总目提要》等国学书籍和《世界名家短篇小说全集》等文艺书籍；并出版《紫罗兰》(周瘦鹃主编)、《游戏世界》(周瘦鹃、赵莠狂主编)、《星期》(包天笑主编)等杂志。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950年，大东书局被人民政府接管，1956年，大东书局职工并入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新华书店、大东印刷厂。塔楼(小白楼)曾作为外文和美术书刊的销售处，下面房屋一度被上海美术书店租用。因建筑年久失修，塔楼上层部分已被拆除，下面房屋还在继续使用，一直到1998年拆除，在原址上建起了百腾大厦。

时尚酒店所在的转角大楼貌不惊人，曾为上海书林最大的门市

再往东经过山东南路，在福州路与河南中路路口的西南转角处，有一幢大楼，地址是河南中路221号(原四川路棋盘街211号)。此建筑南幢为坐西朝东，五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西式楼房，原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所在地，商务印书馆也是民国时期最大的出版发行机构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新中国成立后在商务旧址成立了中国图书发行公司上海分公司，后又隶属新华书店上海总店管理。到1982年起成为上海科技图书公司，商务旧址也成为上海科技书店，书店共有四个楼面，以销售各类专业的科技图书，在当年的专业类书店中也是名扬一时。2006年，由于河南中路拓宽改建工程，科技图书公司大楼将要部分拆除，上海科技书店不得不搬迁。如今的河南中路221号变成了时尚酒店，沿街店堂也变成了各家商铺，便利店、小吃店等，早已没有旧日的痕迹，唯有水泥柱上的纪念碑在诉说着曾经的历史。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二月十日，夏瑞芳、高凤池、鲍咸恩、鲍咸康等四人共同集资创办了商务印书馆，初设址上海江西路德昌里三号。商务印书馆于1898年进行了出版教科书的最初尝试，后又出版了《华英初阶》等读物。在首批出版物获得成功后，上海商务印书馆即增加设备，扩大再生产，馆址也迁至北京路。1900年又吞并了一家修文印刷局，开始翻译和出版日本的教科书。190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在河南中路设立发行所，由创始人之一的高凤池任所长，全面负责商务图书在本埠和外埠的发售。之后历任所长有沈知方、吕子泉、李拔司等。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和编译所、印刷所一样，是相对独立的业务部门，早期主要以发售商务印书馆的课本为主，兼营商务的其他书籍。1912年，商务印书馆在河南中路211号建造总发行所新楼，成为上海书林最大的门市。

商务印书馆所出版书刊中，除教科书、字典等以外，还包括古籍出版、翻译出版的西方学术著作和文学著作。在古籍出版方



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店，前身为著名的内山书店。 范家乐 摄

面，主要有《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和《丛书集成》等。《四部丛刊》是一部综合性的古籍丛书，在以后的十四年间，又出版了续编、三编，各五百册。《丛书集成》出版于1935年，收辑历代丛书百部，子目中删除重复者，实得四千一百种，约二万卷，四千册，可以称为中国古代学术专著总汇。历史上商务印书馆历经劫难，又不断重生，不仅创造了中国文化出版事业的辉煌，而且至今仍屹立在中国民族出版之林，成为当今中国民族出版的品牌标杆。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商务印书馆迁往北京。

商务印书馆虹口分店的红色基因，正由1925书局接力传承

商务印书馆在虹口还有家分店，那就是1925年3月建成的商务印书馆虹口分店，坐落于虹口区四川北路856号。

商务印书馆虹口分店旧址始建于1924年，建筑设计方为通和洋行，1925年3月开业。1925年至1927年，在商务印书馆虹口分店任店员的陈云同志，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通过阅读《共产党宣言》《马列主义的ABC》这些书籍，深化了他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性，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他开始领导工人罢工，并就此走上了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虹口分店原址一直以书店的业态存在，分别历经青年文化服务部、中国青年社华东营业处、青年出版社华东营业处、华东青年出版社营业部、新华书店上海分店、新华书店四川北路店等。由于四川北路商业街的改造，新华书店四川北路店曾关停了一段时间。

2021年6月26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前夕，全新打造的1925书局开业。1925书局是上海新华书店打造的第一家面向社会大众的红色主题书店，店内开辟一个名为“新华里”的沉浸式红色文化阅读空间，整个空间以“铭党史、砺初心”为主题，囊括了“党史学习”“党史教育”“时代楷模”“展望十四五”等板块，丰富党史学习资料，带领读者回望党的百年历史与辉煌。而在外部大厅区域，则打造出一个第三类阅读空间，提供传统文化、人文社科、哲学、政治、文化艺术等图书。1925书局还辟有商务印书馆历史资料的展示，是传承红色阅读文化的一个好去处。

承载重要历史的内山书局，蝶变为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店

沿四川北路一直往北，在山阴路处便是内山书店旧址。旧址所在的是新式里弄，共有三层，建成于1924年。内山书店1917年开设于虹口北四川路余庆坊弄口旁的魏盛里(现四川北路1881弄)，1929年迁至北四川路斯高塔路(现山阴路)11号。内山书店的店主人为内山完造、内山美喜子，是一家专售日文书籍的书店。1916年，内山完造携夫人内山美喜子同赴上海，于

1917年以美喜子的名义创设了内山书店。书店最初通过牧师从日本购进一些觉醒社出版的《逆境之恩宠》等基督教福音书出售，后在读者的建议下，增加了岩波书店哲学丛书等一般性读物，营业额也迅速上升，主要的读者大多是旅居上海的侨民等。

1924年内山完造买下了魏盛里临街的一所房子作为独立的书店经营场所。1929年，内山书店迁至施高塔路11号营业，书店的规模也逐渐增大。内山书店经营中以诚信为本，书籍全部敞开陈列，读者可随时翻阅；店里摆着可供读者休息和看书的长椅和桌子；在书店外的人行道上设有茶缸，免费为过往行人供应茶水。任何人在书店都可以赊账，店方从不催账。

1927年10月鲁迅从广州抵达上海。鲁迅到上海的第三天，就去位于四川北路魏盛里的内山书店买书，从此成了书店的常客，也结识了内山完造，并为之成为挚友。据《鲁迅日记》披露，从1928年到1935年的八年间，鲁迅累计去过内山书店500多次，买书一千多册。鲁迅在内山书店买书，基本上有两种方式：一是自己在书店挑选新书，二是通过内山书店直接从日本邮购，由店员将书送到自己家里。内山书店还成了鲁迅与日本友人相处的去处，有50多位日本左翼作家抵沪时内山都在书店里邀请鲁迅与之会面。内山还支持鲁迅办了三次版画展览。内山书店不仅为鲁迅提供了许多书籍等书稿，而且出售当局查禁的进步书籍，代售《铁流》等进步文学作品，并且从1932年起成为鲁迅著作代理发行店。

鲁迅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与内山书店有密切的联系，不仅往外发出的文章由书店代传，寄过来的书信和稿费也由书店代理。在非正常时期，内山完造还为鲁迅提供避难场所。鲁迅多次通过内山书店避难，在内山书店会见了萧军、萧红等文学青年，通过内山书店转交了红军将领方志敏托交中共中央的报告和遗书等等。

1945年10月，国民党当局以敌国侨民强令内山完造回国，内山书店作为敌产被没收，至此书店停业。

现在的内山书店旧址在新中国成立后几经辗转，曾先后为中国人民银行、工商银行使用，现新开业了“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店”，是对虹口书香文化的极好传承。书店共有三个楼面，店内有诸多的鲁迅因素，内山书店是鲁迅于1927年定居上海后光顾最多的书店，在动荡的岁月中，鲁迅先生在此买书、收转信件、会客和避难等，鲁迅在内山书店的各种活动促成了他与内山完造极为深厚的友谊。书店一楼主要包括内山书店原址、“引玉集”和“南腔北调集”三个空间，一楼大厅的“引玉集”借用鲁迅编选的中国第一部苏联版画集《引玉集》之名，取其“抛砖引玉”的寓意，以博物馆式的陈列，深度呈现中日文化交流的图书，并辅以海派文化、主题图书以及书店自主研发的文创产品；“南腔北调集”是“石藤”咖啡馆与“山内山外”花店的所在地。二楼被划分为“而已集”和“集外集”两大空间，也是书店主要的经营区域，为读者提供社会科学、哲学、美术、艺术、文学、影视等门类的精选书籍。

挑一鸣